

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

李世安 李 娜

【提要】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一开始,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两次明确要求全党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以唯物史观为国家政治生活一切领域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此后,包括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经过探索和不断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构建了不同于西方体系和苏联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西方思想与史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出现了历史观混乱、唯物史观被淡化、立场观点不鲜明、西方化思维明显等问题。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守正创新、自信创新。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国世界现代史 学科体系 建设

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时代大潮与全球风云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研究世界现代历史的演变情况、探寻其发展规律,科学再现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历史,把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和光明的未来贯通起来,准确把握历史脉络,牢牢掌握历史主线,建设好新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

一、延安时期的探索和成就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研究历史、观察一切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现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人类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派别。”^①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①

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出相关指示,要求全党用唯物史观学习与研究历史。1937年8月,《解放》周刊登载了斯大林的《论联共党史课本》(以下简称《联共党史》),供大家学习。^②1938年9月,《联共党史》出版,中共中央将《联共党史》列为各级党校的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初,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明确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和《联共党史》列为中高级干部必修课程。这一指示改变了延安史学界在历史观上各执己见、流派纷呈的局面,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党史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③1941年,《解放》周刊专门刊载了1934—1936年苏联政府和学术界通过的《怎样写历史》的相关材料,并再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学习与研究历史。^④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延安学术界开始进行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张闻天、陈昌浩、杨松、邓力群等人编著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书籍和资料。由于当时世界现代史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三个部分,还没有独立成一个学科,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实际上就被看成世界现代史。^⑤

1938年,延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和“学术中国化运动”。在运动中,艾思奇结合中国实际,于1941年发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文,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辩证法唯物论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研究。^⑥他高度赞扬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毛主席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工人阶级也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不断取得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⑦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提出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他说,研究历史“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成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⑧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对党史学科的建设,而且对包括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科的分支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久,艾思奇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世界现代史》(油印本)。^⑨艾思奇把世界现代定义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他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② 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解放》第13期,1937年8月,转引自任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任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④ 《怎样写历史》,师哲编译,《解放》第134期,1941年8月,转引自任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张剑平《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发展》,卜宪群、王建朗、张顺洪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2辑·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⑥ 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第126期,1941年3月。

⑦ 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13、56页。

⑧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⑨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本。

阶级的革命胜利成为实际可能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②《共同纲领》中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唯物史观,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共同纲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生活一切方面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新中国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思想基础。

二、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1953年中国设立世界现代史学科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中国向苏联学习,但没有照搬苏联体系,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苏联体系进行改造。

列宁曾把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789—1871年、1871—1914年、1914年以后。其中第三个历史时期,就是世界现代史。在时代的划分上,列宁主张“应该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③据此,列宁选择了一战爆发为世界近代史的第三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因为列宁发表此观点的时间是1915年,不可能用后来才爆发的十月革命为开端。

1934年斯大林发表了他对时代划分的观点。斯大林对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和分期与列宁不同。斯大林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虽然斯大林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结束了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他以1918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第三个历史时期的开端,以1934年为下限。^④

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建立了独立的世界现代史学科。根据列宁关于十月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立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思想,以及“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的思想,^⑤苏联世界现代史学界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在中国,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世界现代史划分时代的方法。他说,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⑥1948年他又说“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⑦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讲话精神,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界经过长期酝酿,逐步达成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其内容围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三条线索展开的体系共识,建立了中国自己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二段”“三线”体系。^⑧

① 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第39—40、57页。

② 罗文东《中共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25页。

④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年),《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23页。

⑤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5、571页。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⑦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1358页。

⑧ 张象《五十年后的感悟与思考——再议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昆明世界现代史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月,第2页。

但是,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受时代局限,在改革开放前,虽然这个体系已经达成共识,并且事实上主导着中国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但是没有能够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公开确立这个体系。其原因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非常复杂,而世界现代史涉及许多敏感的现实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因此,世界现代史的断代史著作,特别是世界现代史教材的出版非常困难。

1960年,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世界通史》教材,包括了现代部分。这部教材完稿后,由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但在出版的这套教材中,只有《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和《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而没有《世界通史·现代部分》。

“文革”开始后,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和其他学科建设一样,受“极左”路线干扰,处于停顿状态。但由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需要开展世界现代史教学活动。因此,在举步艰难中,世界现代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所恢复,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没有多大进展。这种状况延续到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学术界解放思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确立了“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学科体系。

国家教育委员会在“文革”结束后曾组织专家编写全国统编的世界现代史教材。这套教材有两本,第一本是1977年10月由西北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史地系、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等院校教师组成的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世界现代史》上册(1917—1945)。在编写过程中,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师范学院政史系教师参加了讨论。这本教材在“导言”中明确宣布“世界现代史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①该教材虽然内容较简单,但突出了十月革命、突出了中国,特别是突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例如,在教材的第二章第二节,专门列出一个子目为“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目标题是“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②但这本教材只是内部教材,当时未能公开出版。恢复高考后,这套教材曾作为我国许多高校的教材使用。

第二本是1979年1月由西北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史地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杭州大学历史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专家组成的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世界现代史》下册(一)。这本教材的内容比较丰富,涵盖的时间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从战后各国的重建到70年代“第三世界联合反霸的斗争”,以及叙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等。这本教材开始时,也是以内部教材的形式出版。^③后来这套教材经过修改,于1984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后,在“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以二战结束为分界线,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学科体系框架下,各种版本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先后问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88年,人民出版社、部分地方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有徐

① 世界历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上册,内部印刷,1977年,第1页;1984年该书经过修订,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世界历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上册,第101、219页。

③ 世界历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下册(一),内部印刷,1979年,第8页。

天新、梁志明主编的《世界现代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继德、高平等编著的《世界现代史》(云南出版社1985年版);夏景才等主编的《世界现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苏州大学历史系主编的《世界现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斯德主编的《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些教材坚持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教材编写,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开端。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确立,促进了中国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三、苏东剧变后唯物史观和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

苏东剧变后,西方刮起了一股攻击和否定唯物史观的思潮,对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提出了挑战。有人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现在用它,“远水解不了近渴”。^①对此,早在2004年张宏毅就曾不无忧虑地说“作为这一思想的反映,国内历史研究包括我们世界现代史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主张淡化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提出指导思想多元化,并无分析地照搬和引进西方学术成果。”^②到2011年,张宏毅又指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被严重边缘化,思维西方化问题相当突出”。^③2012年,陈先达更明确指出“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被边缘化”,历史学界出现了“历史观的混乱”。^④其表现之一是“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的出现和各种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史观”泛滥。

作为“史观”,应该提供一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还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但目前中国史学界存在的各种所谓“史观”,丰富了史学研究,但未能提供独立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提出了一些片面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还有一些错误成分。因此,虽然在这些理论中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成分及一些其他合理成分,但是这些合理和具有时代性的成分,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已经有了的观点和理论。

(一) 现代化史观

“现代化史观”是一种很有影响的“史观”。研究“现代化”理论,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的现实需求。而深入研究“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学术上也是合理的。然而“现代化史观”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提出质疑,这就需要商榷了。

“现代化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发展是“一元多线”,而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单线”发展“图式”是斯大林提出的,从此以后,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就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解释为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该学者还说,如果历史单线发展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历史单线发展论就是错误的,

① 张宏毅《唯物史观与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朱佳木主编,张海鹏、于沛、武力副主编《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② 张宏毅《世纪之交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状况与几点思考》,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26期,2004年7月,第1页。

③ 张宏毅《关于提高世界史研究中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36期,2011年10月,第9页。

④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功能》,卜宪群、王建朗、张顺洪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2辑·2012),第1页。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一种科学假说,是不能用经验的历史证明的。“现代化史观”提出后,立即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

其实,五种生产方式并非斯大林一人说过。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论中,五种生产方式的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等提法和内容,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其他一些著述中找到。^①斯大林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从1937年到1941年,中共中央曾数次发出指示,要求学习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学习斯大林的历史研究方法,明确认可了斯大林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②既然如此,中国的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就应该坚持唯物史观。如果再创“现代化史观”,另有新提法,只会引起历史观的混乱。

“现代化史观”持有者赞赏西方的现代化。他们认为,日本学习西方现代化是成功的,而中国晚清就学得很不理想,“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强,阻止了现代化的蔓延”。^③他们把晚清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文化惰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晚清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很多,“现代化史观”只从文化上找原因,而不谈帝国主义侵略和晚清政府的腐败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原因。

在这种史观影响下,史学界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其中否定革命的思潮非常突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指出,有的人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之一。他认为“当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作为研究历史的标准。”^④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一些人用所谓现代化史观美化侵略,是试图颠覆历史认识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源。”^⑤所以,应当消除“现代化史观”的这些消极影响。

(二) 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文明交往”。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今世界,研究这一观点,符合时代需要,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但是,“文明史观”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文明史观”的核心观点“文明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文明的起源、对玛雅文明、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古代文明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世界文明交往理论。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的“世界历史”,是在人们的“交往”中,以往闭关自守的各民族最终达至“普遍联系”而形成的。马克思还使用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等词汇,完整表达了文明“交往”的含义。^⑥此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也已经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和反对“西方中心论”等观点。

第二,“文明史观”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而西方“文明史观”鼓吹西方价值观,强调西方文明

① 何顺果《马克思的概念及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卜宪群、王建朗、张顺洪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2辑·2012年),第313页。

② 《怎样写历史》,师哲编译,《解放》第134期,1941年8月,转引自任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④ 《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专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中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

⑤ 侯惠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第760期,2017年10月10日。

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122页。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轴心。由 M. A. 凯什岚斯基等人撰写的最新版本《西方文明史》就污蔑十月革命、渲染苏联的“恐怖”与“独裁”。在写到冷战结束时,作者宣称冷战的结束和“柏林墙”的消失是西方民主、公民自由等观念的胜利。^①

基于西方“文明史观”中的错误倾向,且唯物史观中已经包含了“文明交往”的思想和其他相关思想。因此,学界应该继续坚持唯物史观,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不应过度宣传“文明史观”。

(三) 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是 21 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从西方引进的另一种历史观。“全球史观”主张把全球当成一个全局进行研究、肯定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并反对“欧洲中心论”。^② 这些在学术上是合理的。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③ 然而,马克思主义亦已经包含并强调了这些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对这些问题更有大量论述,非常深刻。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把全球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人们随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④ 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历史活动范围具有全球性、历史事件具有世界性。恩格斯更明确地说,世界历史就是“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是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的历史。^⑤

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法”;邓小平提出的“面向世界”;江泽民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⑥ 胡锦涛关于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论述,以及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要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的讲话,都是把世界当成全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经典论述。^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中,包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例如,胡锦涛使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提法,^⑧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⑨ 他们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和论述,切实符合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情况,是人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指导思想。

中国全球史学者所说的“互动”指人类之间的交往,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有大量论述,并从理论上阐明了人类交往的原因和本质。马克思认为,交往总是伴随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

① M. A. Kishlansky,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Unfinished Legac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影印版),第 505、573 页。

② 刘新成《起伏:关照与书写世界史的第三维度》,《光明日报》2021 年 10 月 25 日。

③ 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4 页。

⑤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3—164 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6 页。

⑦ 《培养世界眼光 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座谈会纪要》,《世界历史》2004 年第 1 期。

⑧ 胡锦涛《抓紧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工作》(2000 年 4 月 9 日),《胡锦涛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5 页。

⑨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37 页。

“交往”是“互动”的。因此,他强调生产同交往的关系,^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②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包括“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体系中,关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和“互动”的论述就更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强调各国人民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等。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更是视全球为全局,用全球眼光进行当代历史研究,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研究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非常重视亚非拉国家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发展、对拉美独立战争、对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亚非拉各国的历史,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伊朗(波斯)、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历史都有系统研究和精辟的论述。例如,他们论述了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甚至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了它们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亦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反对中国史学界存在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洋为中用”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周谷城在1961年曾著文批判“欧洲中心论”,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该以欧洲为中心。^⑤

因此,“全球史观”并不是什么创新性理论。郭小凌就指出,“全球史观”并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他说“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⑥有的学者则指出了“全球史观”存在的问题。例如,曹小文认为,“全球史观”存在“内涵的模糊性”“在实践中存在着非科学性”“理解上的狭隘性”“理论基础的解构性”等。^⑦她还指出,“从哲学的层面上看,西方“全球史观”则与后现代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⑧

西方“全球史观”,虽然标榜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他们往往只要求在叙述西方历史的同时,给予亚非拉主要国家一定的篇幅。在他们的叙述中,仍然是以西方和美国为中心,宣传欧洲和美国“优越论”、宣传西方价值观,实质上仍然很难摆脱“欧洲(西方)中心论”。

布鲁斯·玛兹利希和拉尔夫·布尔特金斯主编,1993年出版的《将全球史概念化》一书,是“全球史观”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该书竭力主张,“全球史观”要用西方的“民主化”叙述历史,给年轻一代灌输“世界公民”意识。^⑨

这种观点遭到中国学者的批判。钱乘旦指出“在全球史一些代表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连这些字眼都不出现。”他强调“扬弃民族

① 《恩格斯致彼·拉甫洛夫》,《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73—75、76、80页。

⑤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周谷城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⑥ 郭小凌《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⑦ 曹小文《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171页。

⑧ 曹小文《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研究》,第171页。

⑨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Boulder Colorado, 1993, p. 2.

国家的立场有可能会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①刘小枫认为,这种观点将使年轻一代“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②

此外,西方一些全球史著作公然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查德·戈夫等人所著的《20世纪全球简史》一书,是美国有影响的全球史代表作。该书以民主和独裁为主线来叙述历史,如在呈现1919—1939年的历史时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说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反自由、反民主意识形态的时代”。^③该书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

从西方引入的“全球史观”,不能取代唯物史观作为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全球史观”,经过批判、“再反思”形成的“全球史观”所提出的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中已经有的理论。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全球视角、交往互动理论、以及它们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全球化问题和全球史,来指导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而不应该用“全球史观”作为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避免历史观混乱的状况出现。

(四) 整体史观

“整体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把世界历史定位为“从分散到整体的全部历程”,并且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纵向”和“横向”双线说。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该理论的“纵向”,“从分散到整体”是该理论的“横向”。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从彼此分散到逐步密切联系,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

“整体史观”有合理因素,如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为其“纵向”、反对“欧洲中心论”等思想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整体史观”论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而且,从实践来看,“整体史观”更注重“横向”理论,即“世界历史就是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纵向理论较少关注。

“整体史观”发表后,迅速流传,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包括了两个要点和思路,一个是各民族“普遍联系”,另一个是“社会形态”演进论。^④普遍联系,讲的是各民族的普遍“交往”。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交往总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事实。”^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历史活动范围具有全球性、

①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

② 刘小枫《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转引自程方毅、秦晋楠《今天我们需要何种世界史——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全球化”转向》,《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论文集》2019年12月,第105页。

③ Richard Goff, Walter Moss, Janice Terry, Jiuhwa Upshur, and Michael Schroeder, *The Twenties Century and Beyond: A Brief Global History*, 7th ed.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版),第7页。

④ 何顺果《马克思的概念及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89页。

历史事件具有世界性等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和普遍交往的特性。

有学者在论证了不能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和“社会形态”演进思想截然分开后,指出“不幸的是,自吴于廑先生把世界历史定位‘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以来,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后一点,而仅仅记住了前一点,这是一种误解。”^①

《“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一文也谈到了在历史书写的所谓“横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该文指出:“(世界史)也有明显的缺陷、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书写横向历史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抛弃了纵向历史。”^②

历史观的混乱,在苏东剧变后对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在中国目前的世界现代史教材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现代史》明确要求学生用唯物史观作为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史的方法外,其他教材基本上没有这样要求学生。因此,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设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就成为当前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由于历史观的混乱,在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产生了在“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等指导下发表的大量论文,并出版了供全国学生使用的教材。

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有了市场,出现了否定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否定苏联、否定苏联体制、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等问题。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也出现了碎片化、西方化等问题,严重干扰了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

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其一是反对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开端。有学者认为,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缺陷颇多”,“这一体系将世界现代史开端时期的历史归纳于一种模式——俄国一国无产阶级打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只“肯定俄国革命唯一地位作用”,“含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③这些学者还对受十月革命影响出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才有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高潮的传统观点,具有片面性,不甚妥当”。^④

在这一时期,虽然总的来说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仍然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是在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四、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要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他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叙述历史”。他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

① 何顺果《世界历史:马克思的概念及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卜宪群、王建朗、张顺洪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2辑,2012年),第311页。

②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

③ 汪宏玉、邵念成、徐正等《略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的国际形势——关于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再认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5期,1988年4月,第33页。

④ 汪宏玉、邵念成、徐正等《略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的国际形势——关于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再认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5期,第36—37页。

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①

历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是由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学科各自又是由多个下一级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②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是世界史学科体系下的一个分支体系。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下,还有根据教学、科研等需要产生的其他相应的次体系,如教材体系、课程设置体系、科研体系等。因此,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巨大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大工程,需要科学的历史观来指导。

历史观是处理历史材料、解释和理解历史、正确评价历史的根本原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重要观点。不同的历史观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但它能决定如何书写历史,即可能把客观历史事实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不同历史观下的历史书写是完全不一样的。^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包括了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创新。毛泽东关于世界现代史时代特征、分期方法、基本框架、世界现代史教材内容的选择等论述,是我国构建中国世界现代史教材体系的核心理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当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观点,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当前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述,以及他们关于构建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有关理论和学术观点,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学术中国化的新发展,是当前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学术核心理论。

此前,中国世界现代史的学科建设由于存在多种历史观,导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例如,在开端问题上,有的学者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有的以1900年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虽然也有学者仍然坚持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开端,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

以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要能标志一个时代的到来,反映时代的性质、时代特征、时代发展方向,揭示站在时代潮头指引时代前进的力量等内容。

有什么样的开端,就有什么样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但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延安时期的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又增加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才确立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十月革命给予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说:“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学习“四史”时,要求学好“社会主义史”,他特别强调要学好十月革命后的百年历史。刘奇葆也明确指出:十月革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联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25日。

③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功能》,卜宪群、王建朗、张顺洪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2辑·2012),第1页。

④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

⑤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79页。

命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①因此,应该坚持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分期方法。

有的教材主编“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其理由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大战中,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剧变都发生在本世纪初,故把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上限,比较合适。”^②这段话虽然不错,但把20世纪初作为开端,却存在表述不准确和没有中国特色两个问题。

首先,既然“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那么就是说20世纪初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独家主宰世界的时代,时代的性质还没有变,由社会主义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的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此,用这种观点作为新的时代的开端并不恰当。

那种认为“20世纪初”包括了一战、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说法,在时间表达上也不够准确。因为一战发生在1914年,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都不是发生在20世纪初。历史时间的表述,有特定的用语。20世纪初,一般指20世纪前几年,并不包括20世纪第二个十年。

其次,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西方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分期方法,是西方话语权的表现。而根据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论述建立起来的、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分期方法,反映了世界现代是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和引领时代前进方向这个根本特征。这种开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才是无可争议的中国话语权。

此外,还有的教材以1900年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分期方法并不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的划分并不要求与世纪的开端一致。以世界近代史为例,苏联20世纪50年代之前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之后则改为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般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改革开放后又有人提出以“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等说法。^③而西方早就用1900年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因此,这种开端不是中国特色,也不宜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现代史学科体系。如上所说,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确立的体系,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分段”和“线索”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它适应当时的学术氛围、反映学界共同认识。然而到了新时代,世界现代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原有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二段”分期法和“三线”线索论,也就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创新。

在该体系“二段”的结构上,世界现代史的下半段,应当延长,尽量反映距今最近历史时期的内容,特别是要反映新时代世界现代史的最新内容。而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三线”,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线索需要发展。我们要站在新时代的新高度,增加新的、能反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的线索,从而更好地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和其他历史内容,以更好构建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需要花大功夫、下大力气。中国特色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① 刘奇葆《在“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第759期,2017年9月28日。

②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③ 上海市历史学会《近年来世界史学术观点选编》,内部印刷,1982年,第79页。

新时代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在研究方法上要进行创新,进行跨学科研究,更好反映环境、疾病、气候变化、贫困、饥饿、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地区冲突、中美关系等影响世界现代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加强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下各次级学科的建设;①要加强学科队伍的建设,提高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素质;要加强相关研究机构的建设和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的建设。②要健全和完善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咨询和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世界现代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资政作用。

在学科体系建设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要把握好教学与研究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不同作用。高校应当以教学为主。大学本科教师的基本任务是搞好教学,而学生的任务则是学好专业,打好基础,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做好准备。不应提倡大学本科生进行学术研究。而研究部门要坚持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要被过多的教学任务分散了精力。

在涉及苏联历史时,应当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对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一些问题。一些研究成果对苏联历史、苏联体制的弊端写的过多,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贡献和评价还不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他强调“苏联为什么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③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国特色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研究冷战历史时,要坚持唯物史观,不能碎片化、西方化,搞历史虚无主义。关于对冷战的解释,不要照搬“冷战是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冲突状态”④的说法,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冷战的起源、性质、过程和结束的历史,客观公正地给予叙述。

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需要增加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内容,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习近平同志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⑤他在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发挥了深刻影响。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前途,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这一论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深刻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促进了世界社会

① 张顺洪《加强世界历史学三个体系建设——思考与建议》,《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论文集》,第231页。

② 1979年,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成立,挂靠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991年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合并,成立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下设两个独立的专业委员会,即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和世界现代史专业委员会。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④ 《美国外交政策白皮书》第1卷,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世界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⑤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17页。

⑥ 《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2月3日。

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等,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因此,在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融入世界现代史,突出中国在世界现代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突出当下中国为世界变局引领正确方向、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和成效,是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决议》对中国百年奋斗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深刻影响着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国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既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验证,也不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成功,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色,及其与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高度适应性的统一;在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核心专属成分,同其他文明、其他制度中的非专属成分有益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熔铸出一个具有强大学习与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体系,在锐意求治的导向下不断更新着人类关于现代化与文明发展的知识与实践体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极大改变了文明发展的世界环境,改变了现代化文明长期被锁定在源于西方软硬实力霸权的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局面。在西方霸权和意识形态影响下,广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屈从少数西方国家的利益;同时,随着西式现代化的推广,其固有的弊端越来越全球化,导致包括“文明冲突”与身份政治异化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西方控制,进行独立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带来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②由于中国百年奋斗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发展真正从西方化的单一文明定式中,彰显了文明多样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因此,在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讲好中国百年奋斗史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目前一些教材的教学内容太杂,面面俱到,重点不够突出。例如,世界社会主义史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现有教材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因此,需要进行教学内容改革、课程设置改革,并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建设世界一流的世界现代史学科,还需要批判地吸收国外世界现代史研究成果,特别是介绍西方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以及引进国外第一手资料,以便使中国的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与时俱进,把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在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要注意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转化为中国话语权,推向世界。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论述《资本论》的术语时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③新见解需要创造出新术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学术理论的革命,必然有术语的革命相伴。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2月31日。

② 林毅《百年奋斗历史蕴含的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1月25日。

③ 恩格斯《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加强话语权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国际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体系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①因此,我们要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把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中国话语权,在世界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这个体系。这样建立起来的体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才能在世界史坛上享有中国话语权。

(作者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086;
李娜,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邮编:100090)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

徐志民、(韩)孙安石、(日)大里浩秋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该书紧扣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二是他们的团体活动,重点考察他们的留日生活与近代中日两国的教育政策、财政状况、社会心理、思想意识,以及与中日关系之间的互动与因应,力图呈现一幅相对细腻和生动具体的留学生生活画卷。鉴于既有研究往往侧重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出国史”和“回国史”,而真正意义上的在日“留学史”研究相对薄弱。因此,该书发挥中日韩三国学者联合研究、集体攻关的合作功效,充分搜集史料,尤其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生活与团体活动的相关史料,相当程度上丰富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研究。总体而言,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生活、经费问题、人际交往、翻译编辑、文学创作、社会活动等生活百态和人间诸相。留日学生的团体活动,既有清末留日学生的重要组织励志会、译书汇编社、清国留学生会馆、军国民教育会,也有抗战前后中共东京支部、中华学艺社、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等开展的主要活动。无论他们的个人留日生活还是团体活动,大多围绕着留学与救国的主题相互交织,展现了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半个多世纪的留日生活谱系与中日关系变化。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Wang Qingcheng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Yu Hepi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 great transform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l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drove the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a group of scholars played. Among these famou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cholars was Wang Qingcheng. On the one hand,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history, initiated the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nd promote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he advocat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new research areas such as urban history and modernization studies in the national planning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ast anti-imperialism/anti-feudalism was the dominant them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Wang's effort, a new dimension of modernization was add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them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Chen Tian

Historical nihilism emerged in China in the mid-to-late 1980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t developed from the initial denial of Mao Zedong's role in history and its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its deni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Party, of new China and of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explicitly spread in big-character-poster style and implicitly infiltrated into academic work, extending its influence into daily life.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undergone four important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hanges. In each stage, it seeks different targets to deconstruct, and it is embodied in different content of academic analysis and judgement. Correspondingly, it also invite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various refutation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t. They have been tracking its change and studying its trend closely and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it timely. They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bject, Media, and Cont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Shixue Yaolu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 Wei Lei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Li Dazhao's *Shixue Yaolun* (*Historical Essential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t became a credible source for many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book was also disseminated in the form of some most advanced media in modern China, such as books,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libraries. With the spread of the book, as its content was in line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demand, this book's views, theories, and ideas had been recognized by historians in China, who further spread its influence by introducing it to a wider audience and quoting it in their own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Commem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an Academic Relation // Guo Hui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ography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ommem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emory. In particular, historians in China have made some new achievements by incorporating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to their studies.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are not always observed in the lens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In recent years, historians that study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have been delivered fruitful results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ir own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their findings are more related to commemoration than to "memory". Its absence of distin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from that of commemorative history has presented the field with many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deal with criticisms in a positive way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 cleare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will increase historians'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help them to focu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sel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aise their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 Li Shíán, Li N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only scientific standpoint in historical studies. As early as in the Yan'a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d twice offered concrete directives requesting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the guiding ideology in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ith a constitutional nature stipulated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the only scientific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view in all walks of this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Since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y discipline, including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has been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and the Soviet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West, China's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faced some problems after the mid-to-late 1980s, such as the confusion of historical view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gue position and unclear standpoi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rapid Westernization of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uphol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Marxism, especially the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oing so, we can place ourselves on the fron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draw 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iography // Gao Liao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y took its roots in the rethinking of modern Japan and w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rise of the fiel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Kouza-school and the Rono-school appli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ing the nature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Debate on Japanese Capitalism. After the 1960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Japan, rural history researchers not only continu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fields but also explored various new themes such as peasant movements and autonomous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were subsequently revised.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earch on rural history declined right after its flourishing, gradually fell into a state of fragmentation, and became marginalized.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new trends started unfolding, such as an emphasis of market factors. Rural society is not only an unavoidable and important subject in Japan's modern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 key entry point of Marxist studies of Japanese-style capitalist society.

Rethinking Neo-Colonialism // Bi Jiankang

Neo-colonialism has long been a heated debate issue among scholars. While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been criticizing neo-colonialism through various approaches, scholars in China are also debating this concept. After the World War Two, neo-colonialism evolved from old colonialism, and shaped new coloni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is is what Kwame Nkrumah conceptualized, the realistic basis of classical neo-colonialism. In the 1970s and 1980s,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o-colonialism had undergone some major changes. This "developmental neo-colonialism" is what colonialism has become of under the neo-liberalism during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eriod. Ample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logic have fully proved that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eo-colonialism.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Rise of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1873 - 1940) // Hong Yuqing

After Serbia gain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 vital debate on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s, concepts, and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broke out between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former support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folk epic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latter supported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ebate lasted for almost 20 years and ended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Critical School. This gave birth to the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lthough the two schools differed in their approaches, they were in fact consistent in their focus and key narratives of Serbian historiography. It was through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that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embraced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 two schools that it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guid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us establishing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